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 世 纪 的 指 南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彭 富 春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彭富春(1963-), 男, 湖北仙桃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哲学美学研究。

[摘 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在于, 它是对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的反思, 是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 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表现。

[关键词] 三个代表; 全球化;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6 \ | 0704-08

在新世纪初, 中国和世界出现许多重大的事件。作为伟大的政治事件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承上启下, 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历史。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无论是江泽民的政治工作报告, 还是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其灵魂都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释。它强调: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显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思想的问题, 甚至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 它不仅对于实践者来说是要认真实践的, 而且对于思想者来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在此我们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人们说思想总是时代的思想, 这无非是说思想是有其时代性的, 同时是说思想是被时代所规定的。那么, 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人们称它为全球化的时代。所谓的全球化是指全球成为了一个整体, 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和整体构成了必然的关联, 并被整体所规定。因此, 全球化最终实现为民族国家和全球的共同存在, 个体和全球的密切交流。这对于中国来说, 就是中国变成全球的一个单元。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 就是他转变成全球的一个分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中国必须克服“中心国家”的心态和闭关锁国的作为, 向全球敞开, 也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

当然全球化是多重化和多维度的。在经济方面, 世界成为了一个大市场。每个民族国家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市场, 而是成为了世界大市场的一个环节。于是, 这个世界大市场的买卖的游戏规则便具有了最高的规定性。这意味着各民族国家不是按照自身的意愿而是按照世界共同的游戏规则参加到国际的游戏当中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使国内经济纳入国际经济的秩序之中, 这要求国内的相关法律与

世贸组织的规则相适应,有的废除、有的修改、有的新立。进入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一方面获得了很多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许多风险。如何抵御风险而抓住机遇成为中国进入全球化游戏的一个首要的任务。

与此同时,经济自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如同当代一样将经济和科技知识结合得如此之紧。知识经济的兴起使科技和经济发生了密切的关联,科技给经济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从非知识经济到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的关键点在于,科学、技术和生产从它们的三足鼎立到三位一体。在历史上,科学、技术和生产虽然也有关系,但它们之间却有一定的缝隙。科学作为知识学,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技术作为手段和方法,是对于应用的过程的实验;生产作为物质的加工,是制造商品并满足市场的需要。从理论到方法再到商品的转换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但在现时代,这一距离被克服了,被跨越了。因此,作为知识的科学和技术成为了资本,特别是所谓的核心技术更是一秘密的生产资本,形成了新的经济。

知识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科技和经济的结合,实际上有赖于科技自身的进步。科技在它自身的发展中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机械技术,第二次是信息技术。当代技术的根本特征不再是机械技术,而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关于信息制作、传输和控制的技术。它的突飞猛进使我们的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和高科技时代。如果说机械技术是人的体力的解放的话,那么信息技术是人的智力的解放。如果说机械技术促使了人对物的加工的话,那么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人和物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了人自身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当然,在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里,不仅有信息技术,还有原子(核)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它们都制造了一个人类不可预知的世界。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多重的艰巨任务。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的国家,中国不仅要完成工业化,而且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必须承认,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走向工业化的国家。一方面是工业化对于农业的冲击,其中出现了“三农”问题和城里的农民工问题。另一方面是高科技对于技术落后的工业的威胁,这使那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中国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缺少竞争力。对于这种多重艰巨任务的克服,中国经济有待于跨越式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全球化使各个民族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它们的和解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在世界历史上,存在过多种文化形态。但就其主体而言,一般分为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历史上由于地域的限制,它们都有自己的影响范围,由此他们的冲突也是局部的。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既吸收了外来文化,如印度的佛教,也影响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如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文化。但它几乎没有和世界上的其它文化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引发民族之间的战争。

世界不同文化的相遇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导致的。以基督教精神为支柱,资本主义充分表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其帝国主义的霸权本性使其在非基督教地区贯彻殖民主义文化。但现代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世界分为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文化的冲突被掩盖了。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文化的冲突则成为了世界性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使不同的文化交会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使它们不断发生碰撞。文化的冲突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以美国主宰的西方文化和其它各民族文化的矛盾。虽然人们试图依赖于“金规则”(如不许杀人等)之类来建立普世伦理,但这样一种共同的底线无法克服各民族文化之间其它方面的鸿沟,其天壤之别犹如上帝和魔鬼。特别是当民族的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利益结合的时候,文化的冲突就愈演愈烈了。如“9.11”事件就是这种冲突的极端表现。它不仅是一场恐怖主义的噩梦和悲剧,而且也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斗争的血腥结果。

中国当代文化一方面仍然保持了与传统的关联,另一方面受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美国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多重的。其一是所谓的精英文化,主要是哲学、宗教和艺术等,它们主要表达了近代以来的人权的基本思想,即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其二是所谓的大众文化,如好莱坞的电影等,其中一些是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混合物。其三是其日常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如牛仔服和麦

当劳等,它们表现出与中国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不同的新奇和时髦。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文化由于全球化的浪潮已融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文化的整体之中,并且不可避免地为其所渗透。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建设中国当代自身的文化。

在政治方面,全球化也使世界的政治势力以及相互关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 世纪欧美的帝国主义曾建立了资本主义世界整体。“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缺口,引导了共产主义的新潮流。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就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但随着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自身的瓦解,世界的政治图形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界限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自身特性则充分表现出来。因此,出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美国 and 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一世界、欧美发达国家的第二世界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其中当然是美国和苏联主宰了整个世界。20 世纪末,由于苏联的解体,两个对立的世界的阵营已不复存在。世界政治出现了多极化,但美国依然作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政治的多极化表现为:不仅美国和一些传统的反美国家充满了矛盾,而且它与其盟友欧洲也有很大的缝隙。不仅“旧欧洲”和“新欧洲”国家不很和谐,而且“旧欧洲”国家自身如德法和英国也很难统一。与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同时是美国的单边主义。美国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考虑,力图将自身的意志强加给世界。于是,美国的政治成为了世界政治,美国法成为了国际法,美国的规则成为了全球的规则。如美国和伊拉克战争就是它奉行政治单边主义的典型案例。

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世界的多极化的矛盾往往以人权和主权的矛盾表现出来。美国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要求人权的普遍性和世界性,而一般国家的主权高于人权则突出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特利益。事实上,美国的人权至上论在理论上是值得怀疑的。人权当然有其普遍性和世界性,但人权自身是历史性的,人权的实现也是历史性的。如果脱离历史谈论人权的普遍性和世界性,那么这只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空谈。人权至上论也在实践上也是具有欺骗性的。美国虽然也一贯主张人权,但它只有当其自身的国家利益遇到伤害的时候,才会挥舞人权的大棒指责和惩罚它的敌人。因此美国的人权至上论隐藏着其自身的民族利益。

在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美国的单边主义之间,中国当然奉行政治多极化,反对单边主义。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与美国的矛盾,也会遇到与周边国家及其它国家的矛盾。特别是在与美国的关系中,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要与其积极展开有关人权等领域的对话。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世界多极之中的重要一极。

总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政治多极化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世界中,中国面临一个自身道路的选择问题。它既不可能是传统历史的非中断性的延续,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也不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简单移植和模仿,如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而是走中国当代独特的道路,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样的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加深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新世纪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的思想回应,是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

二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如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现实的结合。因此,它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其历史性的贡献是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历史唯物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剩余价值学说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而这两方面又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使之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在马克思的墓前的讲话”有一经

典性的总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第776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简明的真理,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根本基础。因此不是自然,也不是精神,而是物质生产活动才是历史的存在。由此在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上,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不是理论规定实践,而是实践规定理论。作为物质生产活动本身,历史存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由此它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于是,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身不断解放的历史,并具体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体现为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作为落后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这样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解放自己。

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找到了土壤。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人们正在探索一条解放自己的道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帝国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侵入迫使中国的志士仁人追寻拯救中国的真理。特别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复辟帝制只是一场历史丑剧,改良主义也逐步失去了其市场,而革命意识成为了时代的主导意识。革命是进步的,反革命是反动的并因此是要被革命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

那么,什么才是拯救中国的真理?“五四”以来中国人实际上寻找了三种真理。一是西方近代和现代的真理,二是中国传统的真理,三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中国对于西方思想的引入具有自身的选择并给与了独特的解释。就近代而言,主要是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就现代而言,主要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意味着人民能够当家作主。但人民凭什么能够当家作主?凭借于他有能力。这个能力在西方的近代就是一种思想的能力,亦即理性。正如民主建基于理性一样,科学也将自身的根基深深植于理性之中。科学作为知识学或知识的系统表达,本身就相关于理性的发展。但“五四”以来中国关于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是一场没有理性作为其基础的启蒙。中国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建立比民主与科学观念的建立还要脆弱。这在于中国现代根本没有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寻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西方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凭借理性,人类获得了在存在者整体中的崇高地位。同样凭借理性,个人拥有其在世界中的独一无二的尊贵特性。当然西方现代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认为理性尚未揭示人和个体的优先性,相反它自身隐藏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成为人和个体的束缚。于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进入到一个更本原的基础之中,也就是人的存在自身。不是理性,而是存在敞开人和个体的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的惟一性。但中国现代思想既没有考虑到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与理性的关联,也没有考虑它们与存在的关联。当然作为民主与科学、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样西方的真理的引入,其根本性的弊端是它们脱离了中国具体的历史现实。当广大民众的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时候,当国家外遭屈辱、内生战乱的时候,民主与科学、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口号显得非常苍白无力。

与引入西方的真理的追求不同,新儒家则努力“返本开新”。“返本”就是回到传统,且回到传统的主流儒家,即从孔孟的原始儒学到程朱等的宋明理学。其核心问题是心性之学。而“开新”则意味着对于传统并非简单地重复,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形成一崭新的开端。它就是中国传统尚未产生的民主和科学等现代观念。因此,新儒学才成为“新”的儒学。但新儒学的创新并非是传统儒学的自我更新,而是借助西方的思想的被改造和被变革。这样一种过程使儒家的基本理念获得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现代意义,也就是具有现代性。但新儒学自身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返本能够开新吗?这需要对于新儒学关于心性的解释进行追问。心性是新儒家思想结构的核心,它被确定为人的根本。但它并没有得到明确

的规定。何谓心性自身,这仍然是一个朦胧的问题。在新儒家那里,心也许是人的意识的主观性,性也许是人的意识的客观性。心性合一也许意味着人的意识的主客观统一。而心性又被理解为良知,即人的道德意识,也就是关于善的意识。于是,它始终没有超出意识之外。作为中国传统真理的复活,新儒学也遭遇到了西方真理的引入一样的命运,即它们无关于中国具体的历史现实。它的返本不应是回到儒家经典之本,而应是走向中国现代的社会存在,它的开新不只是一要生发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而也要建立关于中国人民现实解放和自由的学说。

西方近现代真理的引入和中国传统真理的复活在中国现代史上都有其不可否认的意义,但也都有其限度,都没有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指南。这样对于中国而言只有惟一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除了它的传播受到阻挠和打压之外,它自身的接受过程也曾被教条主义化。但它最终在中国形成了本土化或中国化。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形态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是他超出那些本本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解放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其性质不可能是议会斗争,而是武装斗争,其区域主要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其主体不是单一的产业工人,而是工农大众。

在这种对于现实问题的分析同时,毛泽东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当然它一方面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借助于中国古老的智慧,特别是儒家的对于现实的实用态度、道家和兵家的矛盾观点和方法等。毛泽东的《实践论》不仅强调存在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而且重申实践对于理论的优越性。这样他不仅要求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且要求行先于知,行重于知。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对事物自身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但更是关于把握事物时“一分为二”的实践策略。

《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革命学说的基础。革命不是改良,不是渐进,而是破坏和突变。因此,它导致一个时代的死亡和一个时代的新生。革命首先是政治的并因此是政权的。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的真理之路,即武装夺取政权,并以农村包围城市来消灭统治阶级的政权。其次是经济的。剥夺剥夺者,并将所剥夺的归还被剥夺者。这主要表现为没收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土地和工厂,让人民和国家占有。最后是文化的。改变思想,改变风俗,清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等等的反动影响。毛泽东的革命通过破坏一个旧世界而建立一个新世界。

与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现实的结合。但邓小平理论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而是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同时,它所把握的中国具体现实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于是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学说不同,邓小平思想是建设的学说。从革命到建设的观念的转变当然是艰难和漫长的。为了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抓住了它的活的灵魂,即毛泽东始终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借此反对各种意识形态的神话。同时,邓小平又具体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用以消除对于权威和教条的崇拜,解放思想而达到思想的解放。正是如此,他要求对毛泽东思想作完整全面的理解,而不是拘泥于对其作片言只语的解释。通过这样,邓小平理论克服毛泽东思想中一些非实事求是的部分,并与之相分离,走向改革和开放。

邓小平理论的建设学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建设突出了发展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因此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消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争论对于经济的阻碍和破坏。发展经济就是发展生产力,特别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这是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要发展与相其适应的生产关系,如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制的推行、国企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兴起等。与此同时,精神文明的建设则倡导建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既反对传统遗存的腐朽没落的文化,也反对西方舶来的精神病毒。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建设文明的精神,即建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精神世界。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引了中国现代的革命和建设。不过,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仍然需要变革和发展。这是因为我们不仅远离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而且也远离了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同时对于中国而言,21世纪初比20世纪末更面临着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时代在进步,它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它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当代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响应了这一时代的无声召唤,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形态极其简明,如同是箴言、警句或指令。但它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即中国共产党与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社会整体的最主要的方面的关系。其中先进生产力是关于经济的,先进文化直接就是文化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核心是政治的。这三个方面其实又相关于共产党倡导的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由此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也是对其发展。

第一,关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学说,物质生产是历史的根本动力。它主要包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生产力由人和工具等因素构成。它们是最活跃的因素,自身处在不断的革命和创新之中,即不断由落后的形态转化成先进的形态。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它与生产力较相对地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是相适应,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或者是不相适应,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阶段,具有多种生产力的形态。既有农业社会的,如大多农民是手工劳动;也有工业社会的,如工人对于现代机器的运用;还有信息社会的,如网络技术的普及等。显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既不是指农业社会的,也不是工业社会的,而是指信息社会的生产力。就人而言,它是生产者,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其中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物而言,它是生产工具,特别是具有高新技术特性的装备。事实上,由高新技术所推动的知识经济成为了我国近年来的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即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不断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历史。如在农村剥夺地主的土地并将之归还给农民,在城市开展了私营企业国有化运动等。但我国现存的生产关系具有转型期独有的特色。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计划经济的成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却没有完全成熟。这样生产关系便出现了多样性,其中一些就会制约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让它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在目前,我国的生产关系不仅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突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革命的学说成为了建设的学说,同时也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即建党思想的转变。

第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创造,它遍及人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但最主要的显现为哲学、宗教、道德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文化等构成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形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它们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方面,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因此,作为文化的上层建筑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整体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和世界上其它伟大民族一样,中国在其五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以儒家为主体、包

括了道家和禅宗的中国文化成为了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当然由于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制约,中国文化中包含了许多落后的东西,它们是非科学的、非民主的,因而是蒙蔽的、愚昧的。到 19 世纪末,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特别是当欧美的文化伴随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危机到了生死关头。从此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成为了中西文化碰撞之后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两种选择。与此同时,在“五四”新文化之后,一种由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开始生长。毛泽东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仅进行了经济建设,而且进行了文化建设。在改造旧文化的同时创造了新文化,如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和各种文化知识,提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等。但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消灭了一切文化,使中国成为文化沙漠。改革开放召唤了中国文化的春天。但只是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变得一样重要的时候,文化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只有两个文明的建设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他强调要对人民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强调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

但在当代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格局。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其主体为儒家文化,也有西方现代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还有革命文化,如延安精神等。但流行的却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它的多种形态表现出娱乐、休闲和无意义等特性。在这种种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有先进,也有落后。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流行,它们会对社会主义精神家园的建设构成威胁。

作为先进的文化前进方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民族,又是世界的,它源于传统,但走向未来。为此,中国当代文化要善于吸取一切优秀文化来发展和丰富自己,这要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要继承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借鉴西方民族的伟大智慧,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意味着它必须冲破各种旧文化的障碍与束缚,消除一切阻碍和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关系,建设新型的文化,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正是因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学说就包括了更加丰富和完整的内容,它不仅注重了经济建设,而且也注重了文化建设。

第三,关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正是人民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而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但是,人民的利益在政治上特别是在政党上得到代表却经历了一个艰巨的过程。自从现代政党政治产生以来,党派总是某个阶级的党派,因此它是某一阶级利益的代表。根据阶级划分的学说,党派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其他阶级的。但最初的政党都是代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的。

作为工人运动的产物,西方的共产党自身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尤其是产业工人阶级的政党。它的本质特征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宣言》曾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但随着西方社会的变化所引起的阶级自身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欧洲的共产党开始了自身转型。它们有的变成了社会民主党,有的虽然保持自身的名字,但实质上改变为全民党。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将自己视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农民结盟,反对资产阶级。它不是代表少数人利益,而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利益。这一思想指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时期。但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诸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

党也由革命党成为了执政党,因此它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修改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纲领使它自身既不同于狭义的工人党,也不同于一些全民党。

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共产党的使命就是带领人民去实现这个利益。就一般而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了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权利等,简短地说,就是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自由权。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人权的当然保障者、捍卫者和实现者。就目前具体而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带路人,是幸福生活的谋划者。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就要将人民的意志转化成党的意志,同时要将党的意志变成国家的意志即法律。于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要求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内在统一。它是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的政治文明建设的鲜明表现。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它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南。在这样的意义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完成民族的伟大复兴。

(谨以此文祝贺母校——武汉大学 110 周年校庆,并感谢朱传 先生的大力支持。)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严 真)

A Guide to the New Century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PENG Fu-chun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PENG Fu-chun (1963-), 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lies in that it is a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Wave of the globalization, a creativ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from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s Theory, and a manifest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our age.

Key words: “Three Representatives”; the globalization; Marxism